

编者按:2014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韩国将金属活字印刷术视作其文化符号之一,在中国公众特别是学术界再度引发争议。其实,最近几年,韩国试图争夺印刷术发明权的行为并没有停歇。虽然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近年韩国学界和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活动,确实也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活动激起了一些中国人士的不满。与其义愤填膺地争论,何不静下心来,看看这场争夺战的来龙去脉。

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回顾

江晓原

雕版印刷术:板上钉钉也遭抢

先看雕版印刷术。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了雕版印刷《金刚经》,该经卷末尾印有年份和印造人姓名,原件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这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被公认为中国人拥有雕版印刷发明优先权的实物证据,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这卷《金刚经》当然只是中国人至迟在公元868年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的证据,按照常识推论,中国人也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

然而,韩国却不这样认为。原因在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舍利塔内,发现了一件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原件上没有年份。但是其中几个特殊的汉字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公元680年至704年)创制使用的。此件的印刷年份可以这样推测:不早于公元704年(当年该经才译成汉语),不晚于公元751年(这年藏有该经卷的舍利塔完工)。韩国学者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们宣称:既然《陀罗尼经咒》印刷于公元704年至751年间,那它就应该比王玠印造的雕版印刷《金刚经》早了百余年,于是得出这卷《陀罗尼经咒》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以及“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结论。

但问题在于,这卷《陀罗尼经咒》究竟是在哪里印刷的?它使用了武则天在位期间的特殊汉字,而且“严格符合中国印刷的模式和方法”,它很可能是庆州佛国寺建成时从中国带来的贺礼——众所周知,唐代中国的佛经、书籍等,经常是朝鲜半岛上层社会热衷于搜寻和购买的珍品。事实上,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就是在中国印造的。富路德在1967年的论文中就断言:“每件事都指出,印刷术是在中国发明的,并由中国传播到国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该分册由钱在训著,1985年)也郑重采纳了这一结论。

回想1966年的中国,正处在“文革”的动乱中,人们无暇顾及遥远的朝鲜半岛东南部一个佛寺舍利塔中发现的小小经卷,更没有注意到韩国人借此开始打造“韩国发明印刷术”现代神话的努



黄卓 绘

力。等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中国学者睁眼看世界,才发现韩国人持续不懈打造多年的神话,居然已经在西方和日本广泛流传了!

活字印刷术:韩国不可同日而语

再看活字印刷术。争议的情况更为复杂。

北宋沈括的著名笔记《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有一段早已被中外著作反复引用了无数次的记载,其要点如下: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至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用泥做成活字字模,然后用火烧使之坚硬。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加热熔化冷却后作为固定黏合材料(可反复使用)。这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术的最早记载,这一点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韩国学者也无异议。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曾进行了泥活字印刷术的模拟实验,证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是完全可以实际操作使用的,而不是如某些韩国学者所宣称的,沈括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一个想法”。

从《梦溪笔谈》对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中推测,在毕昇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木活字的印刷,但因木活字的种

种缺点而放弃了。300年后木活字的想法才重新复活,元代王桢于公元1297年至1298年间创制了第一套木活字,并用它印制过《旌德县志》(他担任过6年旌德县的县尹)。木活字最大规模的应用是在清代,公元1773年,乾隆下令刻了一套木活字,共253500个字(许多常用字要刻多个复本——这一点毕昇那时就知道了),并用它印刷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共2300余卷。

木活字的缺点是对木料的要求极高(否则受热、受潮、受挤压都可能变形),而且印刷多次之后木字就会磨损。泥活字固然没有这些缺点,但金属活字岂不更好?15世纪后期,铜活字在中国江南开始流行。然而,对比各种情况来看,铜活字在中国的境遇并不太好。

华燧是尝试铜活字印刷术商业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按照钱存训的看法,他是那些发了财之后想要用刻书来博取声誉的富人中的一员,“他狂热地沉湎于书本”,但20年间,他家族办的出版公司“会通馆”用铜活字印制的书,也只是“至少有15种,共约1000卷”而已。

到了清朝,朝廷也曾造了25万枚铜活字,并在1728年用这些铜活字印刷了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然而这套铜活字却在16年后被熔化用来铸造钱币了!

与在中国的境遇相比,铜活字在朝鲜半岛却是大受青睐。

按照韩国文献记载,公元1234年,晋阳公崔怡在江华岛用铜活字印成《古今详定礼文》。在公元1395年和1397年,朝鲜至少还用木活字印刷过明朝的律令和李朝太祖李成桂的传记。

朝鲜大规模铸造活字始于李朝,太宗十一年(公元1403年)命置铸字所,按宋刊本字体铸10万字,称“癸未字”。世宗二年(公元1420年)铸“庚子字”;世宗十六年(公元1434年)铸“甲寅字”;世宗十八年(公元1436年)又铸“丙辰字”。此外又创制了铁活字,印成《西坡集》、《鲁陵志》、《醇庵集》等书。朝鲜此后很长时间都侧重金属活字印刷,铸有大量活字,据一些学者考证,朝鲜铸造铜、铁、铅等金属活字先后达34次(另一说认为多达40余次),其中33次为政府所铸。这些金属活字绝大部分因兵燹灾害等原因而毁弃,或熔铸为新活字。如今韩国学者所引据的最重要证据,是公元1377年用金属活字印刷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

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来看,在使用金属活字的印刷活动中,朝鲜确实有可能比中国更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将《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在当时也有事实根据。

但是,即便如此,韩国也不可能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从中国夺走。因为《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的印刷,毕竟晚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300余年。就算朝鲜首先使用了金属活字,那也只是在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所做的技术性改进或发展,这和“发明活字印刷术”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实际上也可能再次失落,因为关于在中国境内新发现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报道,近年络绎不绝。而韩国费力多年打造起来的“发明印刷术”的现代神话,最终必将成为见证中华文化传播世界的小插曲——他们引为证据的文献,都不是汉文汉字的吗?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一家之言

南京就像个古董铺子,每一锹下去都有可能碰到文物。正因如此,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在重点埋葬区或施工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的工程项目,必须先考古勘探,才能施工。虽有明文规定,但与巨额利润的诱惑相比,施工方宁愿顶着摧毁重大文物的风险去赶工期。2013年,南京雨花台区金阳东街的一处工地,因施工方未经考古就先施工,导致6座王侯级六朝古墓被毁,声讨之声言犹在耳,今年,南京江宁区宏远大道再次爆出古墓被毁的消息,不得不教人痛心疾首。

此次古墓被毁的爆料来源于一名文物爱好者,由于其发现不少带有莲花纹饰的墓砖,引起大家的关注。随即,南京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第二支队、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博物馆等单位都派出人手到现场进行勘查,初步认定这处墓葬为六朝古墓。而且,刻印莲花纹的墓砖寓示着墓主人非官即富,可惜的是,整座墓葬早已面目全非,只剩下仅有的一面墓壁,已无多少考古价值可言。

古墓所在地是哪家施工单位的地盘,目前虽未调查清楚,但是令大家扼腕叹息的是,古墓被毁的行为到底何时才能终结?这两起被毁事件并非孤例,仅南京发生的类似事件就一再出现。2006年4月,南京雨花台区的某工地上,施工单位封锁大门,大肆破坏工地上的六朝古墓;2007年7月,南京秦淮区卡子门附近一工地上,近10座六朝古墓一夜之间被毁;2011年5月20日,南京丁家村经济适用房施工方急于赶工期,将一座六朝时期的古墓毁掉;2011年2月,南京“将军山”沐英墓及其他沐氏王公墓群被毁……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在触犯法律,却为何频频一意孤行?很显然,相比巨大的商业利益,违法毁墓的成本实在太低了,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未经考古调查、勘探进行工程建设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腰缠万贯的开发商而言,50万元的处罚好似“微风吹拂面”,根本无法起到遏制的效果。

笔者曾听到一位考古学者如此评价此类事件,如果非要给盗墓者和施工方做一比较,为人痛恨的盗墓者远不能与开

发商的施工队相比,因为盗墓者虽然盗取了珍贵的文物,但是对墓葬不至于造成彻底的破坏,而施工队的发掘机却将墓葬、遗址、文物统统铲除,岂不更叫人痛恨?

诚然,我国目前还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城市建设项目纷纷开工上马,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城市建设固然要搞,但不能急于求成,宁可慢一点,细心一点,先把文物勘探清楚,再做施工的决定,仓促行事只会造成大批文物毁坏,这不仅是考古界的损失,更是全社会的损失。而在法律约束方面,也应该加大处罚力度,使违法者有所忌惮,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商周青铜器在俄罗斯展出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 通讯员郭媛)近日,《礼乐中国——湖北省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特展》在俄罗斯展出,吸引了该国众多中小學生参观,当地博物馆还为此组织了一次绘画活动,将孩子们手绘的青铜器和文物展一同展出。

该展览于3月3日在俄罗斯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开幕,将持续到4月10日。这是近10年来大型中国文物展在莫斯科的首次展出,展览展出了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116件(组)精品,包括鹿角立鹤、编磬、建鼓座等国家一级文物。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以收藏19世纪西方艺术藏品享誉世界。该馆为本次展览提供了最大、最重要的白厅作为展场。

据介绍,此次展览吸引了俄罗斯的一些中小學生,他们对中国的青铜器非常好奇,有的在参观的同时还拿起画笔,临摹这些商周青铜器,“参加绘画的孩子最小3岁,最大15岁,他们过去从未见过东方艺术品。”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有关人员介绍。

北京顺义出土汉代古钱币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前岭上村出土了2.8万枚古钱币,重达70公斤。据介绍,这是顺义区首次发现如此大量的古钱币。钱币种类主要为汉代五铢钱,距今约2100年。

据顺义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古币是村民在种树时发现的,目前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这批古币的来历,专家根据钱币种类的分析推测,可能为东汉时期所留。至于为何在此出土如此大量的钱币,专家认为有可能是因为战乱或其他原因,被人临时埋藏在此地。(杜洁芳)

考古探秘

建在沙层之上却历经千年而留存

统万城的未解之谜

本报驻陕西记者 赵建兰

成的河流屏障,可以说,统万城在当时已经是黄河“几”字区域内最坚固的城池,代表了当时城市防御的最高水准。

短命的王朝

据史料记载,作为匈奴的后裔,赫连勃勃是南匈奴铁弗部酋长刘卫辰的第三子,曾在后秦姚兴部下被封为骠骑将军和阳川侯,协助莫突于(其岳父)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公元407年,刘勃勃杀死莫亦干,收编其部卒立国称王,自封大单于,建大夏国,并改姓赫连氏。凤翔元年(即公元413年),赫连勃勃驱役十万各族人民,在朔方水(今陕北靖边县红柳河)之北黑水之南(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以南)营建都城,并取名“统万”,赫连勃勃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发迹地,而要选择另外一个毫无基础的陌生地方新建都城呢?

“作为匈奴族消亡前的最后一位杰出的首领,赫连勃勃艰难称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黑暗的西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动乱年代,赫连勃勃首要的便是积蓄力量,赫连勃勃自立为王时,他的劲敌北魏,已基本统一了北方各部,此外,盘踞古都长安及关中盆地的后秦势力也不容小觑。高平虽然险固,但是要想建国称帝,赫连勃勃仍以立足。”邢福来说,如果以统万城作为军政大本营,就可利用沿边大汉民族已发展起来较为富足的经济条件,积蓄力量,形成与北魏相抗衡的局势,同时,万一战争失利,退亦可守。

然而,作为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



屹立在沙层之上的统万城遗址